

清华哲学翻译系列

主编 王晓朝 副主编 王路 艾四林

哲学人类学

[意] 巴蒂斯塔·莫迪恩 著

李树琴 段素革 译

王晓朝 审校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清华哲学翻译系列”学术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汪子嵩 周辅成 何兆武 杜维明

主编：王晓朝

副主编：王路 艾四林

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俊人 王晓朝 王路 卢风

艾四林 肖巍 邹广文 卓新平

赵敦华 唐少杰 蔡曙山

总摇序

文本、解读、诠释与翻译

清华大学哲学系复建之初(1980年 缘月),万俊人教授提出组织出版“清华哲学翻译系列”的设想(同时纳入清华哲学系学术规划的还有“清华哲学研究系列”、“清华哲学教材系列”和“清华哲学年鉴”均已先期问世),得到本系诸多同仁的响应,也得到国内外同行和友人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因为学者们深知,翻译对于中国社会与思想的现代化进程,对于中国现代学术之发展与创新,对于中国现代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之养育,对于中外文化之交流与互动,具有不可替代之功。翻译与创作同为人文学科基础性研究的两大基本类型,以解读为基础,翻译与创作一体两用,本质上是同一的。

—

简略回顾翻译外国哲学著作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和中国现代学术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或可加深我们对翻译工作之重要性的认识。

“从变法运动到五四运动时期,这是一个启蒙介绍时期,特点

摇员

哲学人类学

是宣扬维新,改良政治,反对传统风俗习惯。”^① 19世纪末,以启蒙思想家严复为代表的一批翻译家率先把进化论和西方哲学介绍到中国来,对中国知识分子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严复先生亲译的《天演论》、《国富论》等八部名著,给中国思想界吹进一股新风,极大地冲击了清末民初的保守势力。启蒙思想家蔡元培先生也是翻译外国哲学的先行者。他于19世纪初从日文翻译了德国科培尔著的《哲学要领》、日本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著的《妖怪学讲义录总论》、德国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成为“早期引进西方哲学的代表”(张东荪语)。出版家张元济、高梦旦高度重视翻译,先后主持商务编译所的工作。张元济先生在出版严复翻译的《原富》(即《国富论》)时强调说,这是“取泰西种种学术,以与吾国之民质、俗尚、教宗、政体相为调剂,扫腐儒之陈说,而振新事国民之精神”^②。高梦旦先生指出:“互市以来,天下竞尚西学,竞尚西文”,但是精通西文不易,只有少数人能做到,为了让多数知识人了解西学,“唯以译书济之,则任其难者,不过数十人,而受其益者,将千万人而未已。”^③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学界翻译、介绍外国思想的大潮初起。杜威、罗素、杜里舒、尼采、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康德、黑格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克思、恩格斯、普里汉诺夫、德波林、克罗齐、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外国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许多著作被中国人翻译过来。翻译者中既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又有思想倾向各异的文人学者,如李石岑、张铭鼎、张东荪等等。这些属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派别的外国思想家的

① 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中国哲学》第二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② 张元济:《答友人问学堂事书》,转引自陈应年等《哲学社会科学翻译的回顾与展望》,《翻译通报》1989年第10期。

③ 高梦旦:《翻译泰西有用书籍议》,转引处同上。

著述 经过中国学者的选择和解读 ,不仅为中国社会与思想的变革提供了思想资料 ,而且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和哲学界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自从张东荪、瞿菊农、黄子通诸先生于 1917 年创刊《哲学评论》后 ,中国才开始有专门性质的哲学刊物。自从 1919 年 9 月中国哲学学会成立 ,举行第一届年会起 ,中国哲学界才开始有自抒哲学理论 ,自创哲学系统的尝试。”^①特别要指出的是 ,在这一时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空前的规模在中国得到了系统传播 ,并随着中国社会的向前发展 ,在解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与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述大量翻译出版。“据不完全统计 ,仅 1919 年到 1920 年短短几年 ,新出版了马恩著作近 100 种。”^②

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 ,中国哲学家为适应新的思想启蒙的需要 ,希望引进西方哲学 ,以振奋和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精神。贺麟先生说他之所以把黑格尔哲学在中国传播开来 ,“与其说是个人的兴趣 ,毋宁说是基于对时代的认识。”“黑格尔的学说于解决时代的问题 ,实有足资我们借鉴的地方。而黑格尔之有内容、有生命、有历史感的逻辑——分析矛盾、调和矛盾、征服冲突的逻辑 ,及其尊重民族的历史文化、尊重自求超越有限的精神生活的思想 ,实足振聋起聩 ,唤醒对于民族精神的自觉与鼓舞 ,对于民族性与民族文化的发展 ,使吾人既不舍己骛外 ,亦不故步自封 ,但知依一定的理则 ,以自求超拔 ,自求发展 ,而不臻于理想之城。”^③

1935 年 ,“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成立。中国学者将编译和研究工作结合起来 ,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的哲学研究。许多中国哲学家在传播西方哲学的同时 ,融会中西哲学 ,创建自己的哲学体系。

① 贺麟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104 页。

② 黄见德 :《20 世纪西方哲学东渐问题》,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 139 页。

③ 贺麟 :《黑格尔学述》后序 ,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 ,第 104 页。

哲学人类学

如熊十力先生在改造佛学唯识论基础上吸取柏格森哲学建立了“新唯识论”；冯友兰先生将英美新实在论与程朱哲学结合，通过分析方法建立了“新理学”；金岳霖先生运用现代西方的科学方法、逻辑学和认识论建立了“论道”；贺麟先生融德国哲学与宋明理学建立了“新心学”等等。可以设想，若无前期的翻译工作为基础，这些融会中西古今哲学思想的现代哲学体系的创建是不可能的。

还需指出的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是当时中国的学术重镇。北大和清华的学术大师们对于翻译外国哲学著作有直接的贡献。梁启超先生就是一位致力于观念变法的编译家。他写了《霍布斯学案》、《斯宾诺莎学案》等文章，后来汇编成《西哲学说一裔》出版。吴宓先生曾校对郭斌苏、景昌极所译的《柏拉图五大对话》，并向其他学者推荐翻译《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一书。贺麟先生于1927年回国，担任北大教授并兼任清华大学教授。他十分重视翻译工作，曾写过《论严复的翻译》在《东方杂志》上刊出，在《黑格尔学述》序言中提出处理译名的四条注意事项，为黑格尔哲学的翻译和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陈康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翻译了柏拉图的《巴曼尼德斯篇》。他认为，柏拉图的每本著作都是一个谜，而《巴曼尼德斯篇》则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因此，他在翻译之外还添加了大量的注释，使它不仅是原作忠实的和准确的翻译，而且还是详尽的诠释。陈康先生的工作激发了不少人研究希腊哲学的兴趣，表现了中国学者翻译诠释柏拉图著作，勇攀世界学术水平的气概。贺麟先生对此评价说，它“于介绍西洋哲学名著方面，尤其开了一个新纪元”。^①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国与西方世界处于尖锐

^① 贺麟：《当代中国哲学》，胜利出版社1957年版，第154页。

摇原

的对立之中。在外国哲学研究领域,唯心主义和被视为美国官方哲学的实用主义受到严厉批判。在这种政治形势下,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翻译工作中,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占绝对多数,译自前苏联的哲学读物占据主流地位。据《全国总书目》统计,从1980年1月到1985年,俄文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140本,其中哲学100种,而同期其他文字翻译为14种,其中哲学15种。

1985年,人民出版社在学术界和翻译界的配合下,主持拟定一份《外国名著选译10年规划总目录》,选列了150种书目作为选题计划,1985年商务印书馆恢复挂牌后,该出版工作移交商务印书馆负责。这项翻译出版规划的制订依据是“补课论”,即认为在民主革命过程中,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软弱和文化上落后,在吸收人类历史上的文化遗产,特别是翻译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方面,做得很不够,任务远没有完成。因此在中国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便责无旁贷地完成这项前人未能完成的任务。这项规划的前十年(1985—1994)共翻译出版西方哲学原著100种,而后十年(1995—2004)由于“文革”的原因,只出版了10余种。^①

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界出现了各类丛书争相竞赛的局面。商务印书馆在长期规划、大量积累的基础上,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1994年共出了140种,其中哲学类的有100种。此外,上海译文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西方学术译丛》、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等等,都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西方哲学著作。人们认识到:“享有盛名的世界各国历代学术著作,不管成于什么时代,出自哪个地域,形于何种文字,都是今天人类拥有的共同精神财富。”(贺

^① 黄见德:《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问题》,第100页。

麟语)“通过这些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一个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的精神世界。许多作者都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种思潮的先驱者、归纳者、宣传者和创造者,他们踏着前人的脚印,开拓着他那个时代和未来的道路,他们积累了时代文明的精华(当然有时亦不免带有偏见和渣滓),包括那个时代社会实践的理论概括,留给后人去涉猎,去检验,去审查,去吸取营养——如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们那样做。”(陈原语)

回顾整个 20 世纪中国学术界在翻译外国哲学著作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我们可以说翻译外国哲学著作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和中国现代学术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翻译对于促进中国社会与思想的现代化,对于中国现代学术之发展与创新,对于中国现代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之养育,对于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具有不可替代之功。时至今日,中国社会和思想的现代化进程仍在继续,中国现代学术仍有待发展,中国现代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仍需外来思想的激励和滋养,而中外文化的交流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向前发展。因此,翻译外国哲学名著仍是值得每个哲学工作者关心、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参与的一项事业。

二

20 世纪中国社会变革之剧烈、思想进步之巨大,是翻译外国哲学著作对中国社会与思想产生重要作用之明证。翻译外国哲学著作这项伟大的事业为中国学术界造就了一大批哲学翻译家,也给中国哲学库藏添加了一大批经典性的外国哲学翻译文本。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翻译是异质文化交流、会通与融合的关键,而哲学关乎思维方式,因此翻译外国哲学著作对于整个中外文化交流
播远

来说堪称关键之关键。

对于处于频繁的文化交流之中的民族来说,翻译工作极为重要。它不仅关系到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也关系到本民族文化的发展与更新。按人们的最一般理解,所谓传统仍是那些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文化、道德、思想、制度等。人类社会在语言出现之前,传统以习惯和习俗的形式来传承和沿袭。语言的产生,进而文字的产生,促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的形成,即以思想为形式的传统出现了。语言除了担负起记载传统的重任外,还担负起逾越时空差距延续和保全传统的功能。然而随着历史的经年流逝和人类生存处境的变化,再加上语言自身的流变,某种传统的本义难免会被遮蔽和曲解。因此,要维系和保全传统,求得传统真相,就离不开对传统典籍的诠释,这种诠释既包括古文今译(《周易》《论语》),也包括经典文本的注释(《孟子》《荀子》)。

经典的原义是指传统的、权威性的基本著作。人类思想史从外观上看是文献的积累和权威性基本著作的逐步经典化。“经典的特质是把描述性的经验上升为规范性的论说。人们首先要把多种经历的经验总结、提炼为格言,以达到表述上的普遍性。在格言式的表达方式中,具体经验已变成普遍常则。但一般的格言、谚语、诗歌,如果没有经典的地位,则只能靠偶然的传播和应用,它的权威性不够,最多被视为一些世俗智能,对人缺少说服力和约束力。经典则不同,经典是一套论述体系,而非一二句格言,经典的文本在获得经典地位之后,其文化力量,其掌握群众的力量,极为巨大。也因此,经典由此成为文化的基本内核,使文化在其传衍发展中获得了自己鲜明的特殊性格。”^①

^① 陈来:《中国文化早期经典的形成》,载武汉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编《哲学评论》,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第 1 期,第 152 页。

在单一文化背景下,经典形成的过程相对简单,而在跨文化背景下,经典的形成过程则要复杂得多。在跨文化背景下翻译经典实质上是一种包括语言翻译在内的文化翻译,既涉及语言的变化与转换,也涉及思维方式的变革。麦金太尔说:“当两种传统相遇的时候,‘我们便具有两类不同的翻译——对等的直译和带有语言创新的翻译。通过它们,传统可以从其初始语言(希伯来语或希腊语或无论什么语)中,转换成后来的语言。注意,翻译的这两种关系可以适用于文本或话语的其他体系之间,不仅在相互不同的语言(如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之间,而且还在视为两个不同阶段或时期的同种语言之间。”^①他所说的直译大体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文字翻译,他说的带有语言创新的翻译则大体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文化翻译。文字翻译的需要产生于文化交流,文化交流离不开语言的翻译,包括笔头的和口头的,而文化融合必将导致不同语言的对应表达。在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中,不同的文化传统会在特定时空中相遇和碰撞,进而发生融合。这个时候就产生了语言翻译和文化翻译的急迫需要。因此,翻译不仅是指日常意义上的语言文字的翻译,即把一种语言文字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文字,而且也指文化学意义上的翻译,即不同思维方式的转换。这两种意义上的翻译在实际工作中是联系在一起的。

一般说来,随着时代的变迁,那些重要的著作经过历史选择成为经典之后,又会产生重新翻译和诠释的需要。产生这种需要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一社会群体所使用的语言自身发生了变化,因而出现古文今释的需要;第二,文化环境发生剧烈变化,在各民族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仅要把外来经典

^① 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万俊人等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页。

翻译成本民族语言,而且要把本民族经典翻译成其他民族语言;第三,在其他民族强势文化的影响下,本民族的传统有断裂的危险,为了在精神上保全本民族的传统并促进本民族文化更新,必须对外来经典和本民族经典进行诠释。

跨文化的经典诠释虽然是文化融合的关键,但我们也必须指出,外来文化的渗入有可能造成本位文化的断裂。“一种传统的信奉者取得对另一种传统的理解,继之而来的可能会有许多不同种类的结果:要获得理解可能要求直接摈弃分裂他们的东西;或获得理解可能导致这样的结论,即不能决定划分两种传统的争论点;在肯定是为数极少但至为关键的某些例子中,获得理解可能导致这样的判断——通过自家传统的标准,用另一传统的立场提供更优越的资源来理解自家传统面临的难题和问题。”^①因此我们可以说,延续传统要靠诠释经典,防范传统的断裂也要靠诠释经典。

经典诠释活动对传统的积极作用首先表现在它有助于突破具体传统的局限性。任何具体的传统都有其局限性。“每一传统都体现在某套特殊言语和行为之中,因而体现在某些特定语言和文化的特殊性之中。概念的发明、阐述和修正(通过这些概念,那些建立和继承传统的人才能理解这些)都不可避免地是在此种而非彼种语言里构想出来的概念。”^②在诠释和翻译活动中,诠释者和翻译者要保证活动的成功,就要对其诠释的对象和翻译的文本有深入的理解。在跨文化的背景下,“两种不同传统的信奉者们把那些传统理解为相互对立和竞争的传统,其先决条件当然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相互理解。这种理解有时候只有通过一套相关的历史转化才能达到。两种传统之一或二者为了能够提供对对方

① 麦金太尔:《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万俊人等译,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5 页。

② 同上,第 195 页。

立场某些特点的描述,可能必须要大大丰富自己,而这一丰富将会牵涉到概念和语言的创新,相当可能还有社会的创新。”^①通过对其他传统经典的翻译和诠释,诠释者既加深了对其他传统文化的理解,又加深了对自身传统文化的理解,从而在思想上逐渐丰富自己,进而达成不同程度的文化融合。

从文化传播角度所阐明的翻译与诠释的本质,实际上向我们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任何哲学创作实质上是一种文化翻译,它基于翻译者或诠释者对来自异质文化的文本的个人解读,经由理解基础上的文字转换,达到概念、语言和思想的创新。所以我们可以说:翻译与创作同为人文学科基础性研究的两大基本类型,以解读为基础,翻译与创作一体两用,本质上是同一的。在中国学界,为什么有那么多老一辈哲学家既有大量的翻译作品,又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以上解释或许能够说明一些道理。

三

宽泛地说来,中国学界对本民族经典的诠释工作已经进行了数千年,中国学术界对西方经典的翻译与诠释也早在四百年前就开始了。翻译者经常受到的指责是:曲解作者原意!诠释者经常受到的诘难是:歪曲传统!究其根源,人们没有区分文字翻译与文化翻译是一个重要原因,尽管我们说文字翻译也无法与文化翻译截然两分。我们组织、翻译、出版“清华哲学翻译系列”,当然不希望我们的作品出来之后受到这样的指责,尽管我们在上面已经指明“曲解原意”和“歪曲传统”实际上是任何一位翻译者和诠释者

^① 同上,第 144 页。

不可避免的。但是,翻译(尤其是要出版的翻译作品)尚需承担为不懂外语者提供研究资料的功能,因此我们仍旧要讨论一下翻译质量的把握。

20世纪西方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理论和翻译理论几乎摧毁了一切客观的翻译标准。比如,后结构主义者德里达说:“翻译可以说是一种对接受语言的转化……但翻译不等于去确保某种透明的交流。翻译应当是去写具有另一种命运的其他文体……即使是最忠实于原著的翻译也是无限地远离原著,无限地区别于原著的。而这很妙。因为,翻译在一种新的躯体、新的文化中打开了文本的崭新历史。”^①美国哲学家奎因也提出过一个“翻译的不确定性原理”。他指出两种语言之间的完全对应关系并不确定,因而不存在两种语言之间的“彻底翻译”,一种语言表达的意义不可能在它原来使用的意义上毫无歧义地翻译为另一种语言。但我们在吸取这些思想中的合理要素的时候,没有必要放弃一切翻译标准,使翻译作品成为译者“任意为之”的产物,使一切译文质量的判断活动都成为不可能。在理解后现代主义者的翻译理论时,我们应当明白他们道出了为以往传统翻译理论所忽略的翻译的一些性质,但并不意味着理解的绝对不可能性、真理的绝对不可能性、沟通的绝对不可能性。如上所说,只要我们对翻译与诠释、文字翻译与文化翻译作相对的区别,对翻译所承担的为不懂外语者提供思想资料的功能和为哲学创作实现思维转换的功能作出明晰的区别,仍可对译文质量提出某些相对的标准,并将提高译文质量视为一个开放的过程。

翻译的直接目标是将一种语言的文本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文本。然而,两种不同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不是完全确定的,这就造

^①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52页。

成了翻译中的某些困难。比如在翻译中发现某种语言的一些词在另一种语言中找不到对应词,一种表达法在另一种语言中找不到对应的表达法,于是译者就用音译、注释、造新词、调整语序等等语言手段来克服困难。

翻译确实总是某种程度上的转译,添加了译者自己的理解,同时也因译者自身的局限而不能准确地传达作者的原意,甚至扭曲作者的原意。但所有语言都具有可理解性,可以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所把握。语言各不相同,但并不会因此而变得完全无法沟通。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孜孜不倦地从事翻译工作。尽管尽善尽美的译文是天方夜谭,但差强人意的翻译总是可能的。无论各种语言有多大差别,但它们都是可理解的。

那么,翻译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再现作者的原意呢?康德和施莱尔马赫说过:我们能比柏拉图本人更好地理解柏拉图。^①施莱尔马赫指出,理解就是从差别走向同一,这是理解的前提条件,因为人与人之间若只有差别没有同一,就不能相互理解,你讲的我不能懂,我讲的你也不能懂;而人与人之间若只有同一而没有差别,就没有必要去相互理解,你讲的我都懂,我讲的你也都懂。只有存在着同一和差别的矛盾才会有理解的需要与可能。理解的目标在于避免误解,理解即重建。因此我体会这句话的意思是,“翻译须理解,理解即重建。”在哲学文本的原作者那里不存在理解的问题,除非他再次阅读自己创作的文本,而只存在被理解的问题。理解是翻译者和诠释者的前提性工作,要翻译和诠释必须理解文本,重建文本,以此为翻译和诠释之基础。因此,若有人夸耀说自己的翻译已经绝对忠实地再现了原著或原作者的思想,那么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本,第 104 页;施莱尔马赫:《柏拉图对话导论》,英文本,桂林:漓江出版社,第 2 页。

他实际上并不懂得翻译活动的本质,若有人说翻译没有任何标准,判断译文质量是不可能的,那么他实际上混淆了原文本与新文本之吻合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关系。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上建立翻译学的探索从未中断。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的专著约 150部,论文达 1000篇。”^①我无法评估这些翻译学体系和已经确立的种种翻译原理对翻译外国哲学著作能起多少指导作用,只好结合自己的工作体会谈一下自己对翻译质量的把握。我在 20世纪 80年代初读过一些论翻译的文章,后来就只有翻译的实践,而没有翻译的理论了。现在回想起来,在有关翻译质量的众多论述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严复先生的三个字——“信、达、雅”^②,另外还有不知哪位学者总结的四个字——“忠实、通顺”。

关于严复先生的三个字,学界有大量讨论,在此不拟详细展开。至于“忠实”与“通顺”,似可作以下解释:翻译者在翻译中要力求“忠实”于原著,在译文表述方面要力求通顺。“忠实”是针对要翻译的异质文本来讲的,或者说是针对原著而言。“通顺”则主要是面对读者受众而对译者提出来的一个译文质量标准。对这两条翻译标准,我们不能作绝对化的理解,也就是说我们把这四个字理解为译者要力求达到的一个目标。我们明白,这个目标在具体工作中很难圆满实现。现今已有的翻译作品,确实没有哪一部堪称绝对无误,我们也不能期盼今后有哪部作品能百分之百地再现原著的意义,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忠实”的标准,任意为之。相对于“忠实”而言,“通顺”的标准更要坚持。试想,一部翻译作品若是连文字都不通顺,那是很难使读者进入愉悦状态、从翻译作

① 梁志学:《关于建立翻译学的问题》,《世界哲学》1998年第 5期,第 97页。

② 严复先生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严复书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97页。

品中吸取思想养料的。

四

跨入新世纪以后,整个清华大学正在向着“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方向发展,清华大学哲学系复建以后正致力于继承老清华哲学系的优良传统,并力求推陈出新。数年来,我们这个新生学术共同体在清华园中寻找自己的立足点,结果发现它就在自己的脚下,我们也在努力探索新的研究领域,结果得到的启发是靠自己开拓,我们不求在短时期内实现所有学术规划的目标,但求每年、每月、每日有所进展。

哲学著作一般比较晦涩难懂,读者面较窄。近年来,受外文版权和经济效益的影响,学术翻译领域呈现萎缩之势。在某些高校和科研单位,“翻译不算科研成果”的规定也在约束着学者们献身翻译工作的热情。在这种情况下,“清华哲学翻译系列”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谢我们在出版界的合作伙伴,他们为我们这个系列的作品提供了出版园地;其次要感谢参与翻译工作的各位译者,他们的辛勤劳动使我们的学术规划得以实现;最后,还要感谢以各种形式支持和帮助本系列工作的国际友人和机构,值此清华哲学系复建初期,这些帮助弥足珍贵。本辑“清华哲学翻译系列”(共四本)的内容较广泛,既涉及西方哲学、哲学人类学领域,又涉及道德哲学和应用伦理学。翻译这些著作表明译者认为这些著作的重要,但并不表明译者认同书中的所有观点。我们相信经过较长时间改革开放之后变得较为成熟的中国学术界和广大读者能够有清醒的鉴别能力,不会重犯“全盘接受”或“全盘拒斥”的旧疾。

本辑“清华哲学翻译系列”(共四本)的出版得到了黑龙江人播源